

五十年文萃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五十年文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年文萃: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建系 50 周年 /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3

ISBN 7-81074-254-X

I. 五... II. 内...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974 号

书	名	五十年文萃
编	者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
任	编辑	石斌
封	设计	丹森
面	字	康庄
题	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5
字	数	1—1000 册
版	数	400 千
期	号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准	书	ISBN 7—81074—254—X/G·27
定	价	全套(24 册):精装 768.00 元,平装 6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 序

希 赫

新世纪伊始，内蒙古师范大学迎来了自己的 50 岁华诞。为庆祝建系 50 周年，师大汉文系出版了大型丛书——《五十年文萃》。这套丛书集中了汉文系 50 年科研、教学与创作的主要成果，反映了汉文系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看到此书，如临故土，如闻乡音，倍感亲切。欣喜之余，我很想为这套丛书写上几句话，以示祝贺。

内蒙古师大汉文系在内蒙古地区建系最早，是全区中学语文教师的摇篮。尽管内蒙古条件艰苦，困难重重，但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汉文系全体教职员教书育人，桃李芬芳，源源不断地向全区乃至全国输送了一批批合格人才，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作为内蒙古人，感谢你们多年来付出的辛勤劳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经过 50 个寒暑春秋，我欣喜地看到，内蒙古师大汉文系不断地发展壮大，目前，已成为校内教师力量强大，学科建设完备，科研成就显著，学生人数众多的龙头专业。在新的世纪里，师生们正

以饱满的热情、科学的态度、不懈的努力,改变着内蒙古教育的落后面貌。我相信,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完善、繁荣和发展,内蒙古师大汉文系一定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建设成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形势的、富有开创精神的专业,并进入我国该专业高等师范教育的先进行列。

大学是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的高级人才的地方。我以为,除了教育和培养职能之外,大学还应将科学研究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综合性大学应该如此,师范大学亦应如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综合性大学科研氛围、力量与条件较之师范院校要强。但是,我感觉到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没有受此影响,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科研活动中,兢兢业业,自强不息,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决非一朝一夕、举手投足之易。汉文系的教师们数十年如一日,甘于寂寞,甘于淡泊,以做“知识人”为乐,实在令人钦佩。其实,耐得住寂寞与清贫,正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教师应有的精神品格。在商品大潮席卷之下的今天的学术界,这种精神尤为可贵。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正是因为有这种可贵的精神,才使他们在条件有限的环境中,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科骨干,产生了相当丰厚的科研成果。我心里真是感到由衷的喜悦。

据我所知,内蒙古各大学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套像师大汉文系这样规模庞大、数量众多、质量较高、学术性强的丛书。汉文系此举,让人感到那里的学术气氛是浓厚的,成果是显著的。同时也看得出汉文系的领导集体

堪称教育事业的“有心人”，他们以新的观念引导着这个集体，努力培养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严谨的治学精神，尽量为教师们的科研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使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协调一致，相得益彰。我们知道，没有理想，没有勤奋，没有学识，没有孜孜不倦的探索，便无所谓教育。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精进不休的精神、科学严谨的态度是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发扬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教师并不重视科研工作，认为一位教师只要上好课便完成自己的天职了。这实乃一种偏见。我希望，持有这些观点的同志们借鉴一下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经验，谦虚谨慎，重视科研，从而使教学与科研比翼双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教好书，育好人。

《五十年文萃》证明了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学术研究实力。丛书精选了汉文系 50 年来，特别是目前在任的教师们多年辛勤钻研的成果，共 24 卷，近 1000 万字，其中包括论文、专著和创译三部分。

丛书中所收的学术著作、论文囊括了语言文学专业的各个领域，从语言到文学，从理论到实践，纵贯古今、横跨东西。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探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西方现当代文学观的解析；在文学实践的研究方面，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包括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完全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中，东西方文学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从古代汉语的虚词，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都进行了系统、深刻的研究。此外，对中外文化、中国书法艺术、语文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就。总之，丛书中所收专著与论文，均以实事求是的态

度、科学的研究方法、新的理念对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体现了研究者扎实的学养功底和创新的学术眼光。

丛书创译编有小说、散文,也有诗歌和翻译作品。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个人认为,此编虽然数量不多,又是业余的创作,但足以表明汉文系教师良好的文学修养、外语水平和勤奋刻苦的精神。在商品大潮冲击的今天,文学创作也日益商品化了。但我感到,丛书所收作品并没有商品的味道。创作者严守着一条准则:为人生而写,为理想而作。我在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就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我建议广大的文学爱好者都来读一读,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着写一写,那将会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这是一套值得肯定的、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丛书。我相信,这套书籍不仅会推动内蒙古的教育及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的教育及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也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知道,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正在努力,成果还会一天天增加,成绩还会一天比一天昭著,我真诚地期待着师大汉文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到来。

值此内蒙古师大汉文系建系 50 周年之际,我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2002 年 3 月

目 录

□ 科举与古代文学引论·····	(1)
一 作为文化的科举及其与古代文学 关系的学术意义·····	(1)
二 科举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几个层面·····	(8)
三 科举内涵的界定与科举阶段的划分·····	(18)
□ 唐代科举与文学·····	(24)
一 隋唐时代的科举考试·····	(24)
二 唐代科举与文士放诞之风·····	(54)
三 唐代科举与诗歌繁荣·····	(72)
四 唐代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	(113)
五 唐代科举与传奇小说的自觉·····	(126)
□ 宋代科举与文学·····	(144)
一 宋代的科举考试·····	(144)
二 宋代科举与宋诗格调·····	(162)
三 北宋嘉祐二年进士科举与文坛风云·····	(204)
四 宋代科举的文化取向与宋文风神·····	(220)
□ 元代科举与文学·····	(253)
一 元代的科举考试·····	(253)
二 元代士人地位与文学转型·····	(263)
三 《西厢记》与科举文化·····	(287)
四 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	(296)
□ 明清科举与文学·····	(308)

一	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	(308)
二	明清科举与文学概观·····	(363)
三	《聊斋志异》中的科举士人群像·····	(390)
四	《贾奉雉》的文化隐喻·····	(406)
五	《儒林外史》与科举文化·····	(418)
□	后记·····	(450)

科举与古代文学引论

一、作为文化的科举及其与古代文学关系的学术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 20 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制度,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十万进士》)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或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在我们的关注和析说范

围内,它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只有从科举文化整体角度来观照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才能较为全面而准确地描述或阐论我们这一专题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譬如对唐代科举与唐诗繁荣关系的讨论,一些学者多拘于唐代省试诗无上乘之作而率然否定以诗赋取士对唐诗繁荣的重要意义,就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做法。其原因即在于只是孤立或枝节地看待某种现象,而不作整体的文化观照。

选择科举而不选择其他制度来与文学作“关系”或“影响”式的讨论,在于这一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干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①

^① 《放宽历史的眼界》,第63页,转引自陈乐民《历史的观念》,见《读书》1993年第11期。

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

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文人饱读诗书、博雅风

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再次，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引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

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

将会遇到许多障碍。”^① 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① 《唐代科举与文学·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二、科举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几个层面

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就其深层而言,大体主要有三个对应的层面,即政治层面、思想层面和文化层面。

(一)政治层面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国的官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以文官政治为特质的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文官制度,而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文官”一词较早出现于《后汉书·礼仪志中》:“立春,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文官。”这里的文官,指的是文职官员,与武官相对而言。中国的科举制度最终促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说:“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他们来掌握。”利玛窦所指的即是中国文官政治的情形。

中国的文官政治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并最终由科举制来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贵族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几种不同的选官制度。它们都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统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世卿世禄是奴隶社会宗法血统政治的产物,是为强化奴隶制王权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但随着封建制的建立、教育的下移,士阶层发展起来,并在政治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新的选官制在萌生。汉帝国建立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选官制度有了新发展。这种新发展的标志是察举制的出现。这种选官制与世卿世禄的血缘世袭不同,带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它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拔贤能之士,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